

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美] 贝内特·瑟夫 著 彭伦 译



At Random

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美] 贝内特·瑟夫 著 彭伦 译

At Random

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

人民文学出版社

Bennett Cerf
At Random: 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

Copyright © 1977 by Random House, Inc.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2002 by Christopher Cerf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 (美) 瑟夫 著;
彭伦 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5965 - 2

I. 我… II. ①瑟…②彭… III. 瑟夫 - 自传
IV. K837.1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8830 号

责任编辑: 赵 萍

责任印制: 王景林

我与兰登书屋: 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Wo Yu Lan Deng Shu Wu: Bei Nei Te Se Fu Hui Yi Lu
〔美〕贝内特·瑟夫 著
彭 伦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3 千字 开本 720 × 1050 毫米 1/16 印张 22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 - 13000

ISBN 978 - 7 - 02 - 005965 - 2

定价 30.00 元

序言

我的父亲贝内特·瑟夫是公认的二十世纪出版业巨子，他以融才华、激情与奉献精神为一身的独特风格，和他的搭档唐纳德·克劳弗尔一起创办了兰登书屋，将一家每年只是“偶尔”出版几种珍藏精装版图书的出版社，发展成为世界上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媒体集团之一。

不幸的是，父亲于一九七一年因心脏病突发而意外去世，使他再也没有机会整理、润色他一九六〇年代末就开始写作的回忆录。多亏我的母亲菲丽丝·瑟夫·瓦格纳和长期担任兰登书屋总编辑的阿尔伯特·厄斯金，他将我父亲的笔记、日记、剪贴本和父亲为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史精心汇编成书，使父亲丰富多样的性格中的每一个侧面在《我与兰登书屋》这本书中都得以栩栩如生地呈现。

完美无瑕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本能；用之不尽的精力与激情；天才的公关与销售技巧；坚定而又兴致勃勃地把握每一次机遇的决断；充满孩子气的魅力；令人信赖的诚实；在逆境中仍不失风趣幽默的惊人才智；不偏不倚的公正与慷慨；迫切受人欣赏、喜欢的强烈愿望；不让自己板起面孔做事的坚持；对自己的好运气总是感到高兴的满足——我父亲用他那充满趣味的文笔，在《我与兰登书屋》中展现了他如何将这有时相互矛盾的特点，转化为自己的优势，实现他渴望的成功，并由此而感到由衷的快乐。

比方说，除了贝内特·瑟夫，当年谁还有那份勇气和魄力在美国尝试出版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部以淫秽为名被禁止引进的书，谁有他那种敏锐的商业头脑，居然安排自己出版社的人员故意走私该书进口被抓，以此在法庭上挑战禁令？（对该书的另外一种选择是：过早推出可能会被定性为非

法出版物的美国版，导致的代价对于像兰登这样规模的出版社来说是极其高昂的。)还有哪个出版家像他那么聪明，居然想得到在美国海关查缴之前，把英国、法国重要评论家赞扬《尤利西斯》的评论贴在走私的书里面？（他解释说：“只有把这些文章贴在书里，我们才能在法庭上当庭引用这些评论。”）在我父亲的竞争者中，有谁能拿出他那样的胆量和魅力，去说服大律师莫里斯·恩斯特免费为他打官司（父亲说：“他跟我一样喜欢出风头！”），还给了他从未谋面的乔伊斯一笔预付金，承诺就算兰登的官司最终败诉，这笔钱也不用还，从而获得了乔伊斯本人的支持？（父亲写道，由于在美国出版过乔伊斯其他小说的维京出版社“不敢”出版《尤利西斯》，乔伊斯为能从这本书上赚到美金而过于兴奋，在去和他见面的路上被一辆出租车撞倒，到的时候“头上缠着绷带坐着，一只眼睛戴着眼罩，一只胳膊挂在吊带上，还有一条腿裹得严严实实，伸直了摊在椅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那只眼罩他是一直戴着的。”他又说。）

同样，也很难想像别人会有他那样的品味和远见。出版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作品，居然还老老实实在地承认，正如他在斯泰因的《美国地理史》勒口上写的那样：“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格特鲁德小姐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格特鲁德·斯泰因很欣赏我父亲率直的幽默，当她看到《出版人周刊》封面上登了作家凯瑟琳·温莎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后，兰登书屋也做了一个广告，选用了斯泰因和爱丽丝·托克拉斯逊色几分的照片，照片下的广告语却说：“嗨，我们也有美女作家！”斯泰因就更高兴了。

由于W·H·赫逊的《绿色公寓》在美国并没有版权问题，从法律角度上，任何出版社再版这本书，都不用向首先引进该书的阿尔弗雷德·A·克瑙夫的出版社付费。但部分因为克瑙夫是我父亲的“出版偶像”，父亲和唐纳德·克劳弗尔在一九二五年收购“现代文库”后不久就拜访了克瑙夫，同意按照每本六分钱的条件支付版税，而此前，“现代文库”丛书的前老板贺拉斯·利弗莱特一直拒绝支付这笔钱。这一异常公道、慷慨的举动，从此成为他们友谊的开端，这也导致了几十年以后，阿尔弗雷德·A·克瑙夫最终作出将其出版社并入兰登书屋的决定。

又有哪位“严肃的出版家”会像我父亲那样，在兰登书屋出版《性心理学研究》不久会见作者霭理斯博士之后，直率地表示对他的失望之情？（“他和蔼可

亲，风度迷人，”我父亲写道，“但是，他不想和一个年轻出版人谈什么性。”）有谁会像他那样，在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参加威廉·福克纳葬礼时，因为在福克纳床头柜上发现一本他编的文集《为快乐而阅读》，而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得意之情？（“[威廉]斯泰伦找到一本他写的《在黑暗中躺下》，”我父亲写道，“也很高兴。”）^①

当然，我爸爸绝不仅仅是作为出版家而为人所知的。他的身份还有：专栏作家，文选编纂者，演说家，电台节目主持人，笑话、轶闻、绝妙双关语的收集者，美国小姐选美比赛的固定评委，收视率很高的电视游戏节目《我是干嘛行的？》嘉宾。有些人批评他一心多用到处露脸，或者指责他在电视上哗众取宠，“有失一个体面出版家的身份”，他会纠正说，他的这些社会活动为兰登书屋带来了许多好处。

比如，通过演讲，他就可以周游全国各地，“到一些出版人——我指的是大出版社的老板——过去从未涉足的城镇。”每到这种地方，贯穿他一生始终的顽皮个性和进取心就显露无遗。“我总是去当地的书店见见店主，跟他们聊聊，也看看他们把‘现代文库’的书放在什么位置。”他写道，“我会说，‘你把现代文库放在书店那么靠里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如果说还没想到要挪挪它们的位置，我就帮他们挪。趁他们不注意，我从‘现代文库’的书架上抽出几种新出的书，放到书店前头的展示架上。”

更重要的是，每周一次在电视上露面的现场直播讨论节目，给了他宣传兰登书屋、兰登作者和图书的一个绝佳机会。对此，他一直乐此不疲地强调。有一次父亲在每周一次的《我是干嘛行的？》节目中不失时机地介绍威廉·福克纳而不是约翰·奥哈拉的最新小说，约翰·奥哈拉看到节目后怒气冲冲地打电话给他兴师问罪，从而证明父亲用意之有效，父亲流露出的那种高兴劲儿，我永远也忘不了。

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杰生·爱泼斯坦（父亲称之为“我佩戴的十字架”，而他以“贝内特是我遇到的一只熊”反唇相讥。）^②曾评价，正是父亲，和贺拉斯·利弗

① 《在黑暗中躺下》为威廉·斯泰伦成名作。——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② “我佩戴的十字架”原文为 the cross I bear，“遇到的一只熊”原文为 the bear I cross，两人在这里是利用多义词 cross 和 bear 互相开玩笑。

莱特、阿尔弗雷德·克瑙夫,以及其他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年轻的犹太裔出版人,一起掀起了书业的革命。爱泼斯坦在《书业》一书中写道,他们“在被上个世纪的偏见统治着的出版社里”与“他们绅士派头十足的前辈决裂”,并“甘冒个人财富流失、得罪前辈的风险,大胆推广文学和现代主义理念。”兰登书屋当初植根于那套名为“现代文库”的再版书系的做法是何等英明!

但是,正如爱泼斯坦本人指出,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出版业,依然是一个“家庭作坊”式的产业。的确,一九六〇年代初我去兰登书屋工作的时候,社里每个人的电话分机都是两位数,整个出版社的人名录打在一张跟明信片差不多大的纸上就足够了。(今天,这样一份人名录仍然挂在兰登书屋的传奇编辑鲍勃·卢米斯办公室的墙上。)也许没有被充分注意到的是,我父亲还推动引导兰登书屋——乃至整个出版业——经历“第二次”革命:他比任何同时代的人都更早、更透彻地意识到了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电视出现为发轫的大众文化、技术、商业和媒体惊天动地的变革,这些变革改变了书业形态,因此终其一生,他使局势以更快的速度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有人会好奇:将来有一天,是否会出现一种“后现代文库”丛书不用归功于他的影响?

我父亲始终将他的一部分成功归功于幸运,他在《我与兰登书屋》的最后几页总结自己一生时说:“我的运气再好也没有了!”确实,在他最成功的几件大事中,运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拿他从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收购“现代文库”的交易过程来说吧,就在这家出版社的发行经理朱立安·梅斯纳即将说服贺拉斯·利弗莱特拒绝我父亲的收购条件之际,一个文学经纪人因为怀疑利弗莱特勾引他老婆,挥舞着一把手枪冲进出版社的门厅。利弗莱特吓坏了,派梅斯纳去应付这个经纪人——这样的事情显然得到附近的地下酒吧去解决——我父亲这才少掉了谈判中态度最强硬的反对者。他写道:“对我来说运气真是好得难以置信呀!”

父亲还非常幸运地碰到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詹姆斯·米契纳。就在此前几天,麦克米伦出版社总裁乔治·布雷特建议这位颇有抱负的小说家,“还是专心做他的编辑工作,别再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写作上了。”当时米契纳还是布雷特手下的教材编辑,刚刚出了一本几乎没人注意的短篇小说集。“我们一拍即合。”父亲写道。他立刻和米契纳签了兰登书屋的出版合同。不到两星期,米契

纳在麦克米伦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南太平洋的故事》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用我父亲的话说，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冉冉兴起的文学新星”。

每当别人问他一九五九年兰登书屋怎么会公开发行股票时，我父亲总是归因于一次令人高兴的巧合：查尔斯·艾伦，美国最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之一，恰好是我父亲当年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短暂受雇于萨托里乌斯-史密斯-洛维证券公司时，坐在他隔壁柜台的年轻收银员。“一天，我就找我这位老朋友查理咨询，”父亲写道，就好像每个出版家都有在华尔街的工作经历，因而上市时机成熟时随便便能找一个老同事咨询似的，“他说，‘当然行，我们帮你发行股票吧。’”

事实上，对我这个永远乐观的父亲来说，就算是坏运气也会变成良机。一九二〇年代初他还在博尼与利弗莱特出版社工作，有一次出版社的仓库着火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把火大概可以烧掉《圣经的故事》这本由于对销售前景过于乐观而造成的大量库存书。可他的希望破灭了：消防队及时赶到，就在“快烧到《圣经的故事》那庞大书堆”的那一刻把火扑灭了。“所幸，”他写道，“还是有几千本被水冲得报废了。”

再来看兰登书屋一次更令人尴尬的挫折——昆丁·雷诺兹在他的畅销书《不肯说话的人》中描写主人公在二战期间为法国地下抵抗运动英勇地完成了许多难度很高的使命，被德国被捕后坚决不招供。有人揭发说这完全是编造的故事。“我明天会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我父亲对雷诺兹说，“我们将宣布这本书不是纪实作品，而是小说。而且书名也马上改掉，不叫《不肯说话的人》，改成《话说得太多的人》。”这个安排极其奏效，我父亲写道：“媒体只是拿这事儿当作一个无伤大雅的骗局把戏来报道，结果好玩的是，这本书的销量比真相曝光前翻了四倍。”

当然，重要之处在于，我父亲有一种神秘的本事，能“创造”机遇——或者发现别人不太注意的机遇——然后几乎一口气兴高采烈地抓住它。在他的好朋友莫斯·哈特^①的一次悼念仪式上，我父亲特别说起，要是有人把他的成功归因于幸运，莫斯就反驳说：“没有人会成天坐在那里说，‘今天我们能成为莫斯·哈

^① 莫斯·哈特(1904—1961)，美国剧作家。

特做些什么?’幸运都是你创造的。如果贝内特·瑟夫不妄自菲薄,或许他也会这样说自己。

我记忆中的爸爸是一个非凡的老师,作为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他不断交流他对生活和工作的想法;清楚、生动而幽默地解释为何他基本上都做到了他要做的每件事;诚恳地要求我们像他一样,充分利用做错事的机会吸取教训。可以想像,他把大段时间投入工作,可他总是能想出法子让弟弟乔纳森和我感觉很受他重视。他甚至有办法一边写两篇每周一期的报纸专栏文章一边陪我,而平时他一般都是周末下午在那栋有花式圆柱的乡间别墅里写文章的,他用业余时间做报纸所做的事情,也是用来贴补买这栋房子(它也被酷爱双关语的爸爸称作“柱子”)①。嗯,更准确地说,是他给我设计了一桩差事,造成了他尽其所能陪我更多时间的“假象”:他封我为“扬基队比赛指定观看员”②。我的任务是,一旦电视里的球赛有什么值得他一看的内容,就马上通知他;然后,他会笑嘻嘻地跟我讨论我打断他的时机是对还是错。(结果证明,我永远是错的,除非是扬基队得分,或者扬基队的投手在满垒无人出局的情况下成功逃脱。)爸爸向我保证,他搞这个游戏的惟一目的,就是“训练我学会判断”。要是我敢说,他在看扬基队比赛的一些关键时刻也流露出一丁小小的兴趣,他表现地就会像受了很严重的冒犯,然后就给我机会,让我到他自己发明的组织“家庭委员会”上申诉。我和我弟弟每人有一票投票权,妈妈三票,爸爸有六票,所以他的观点总是胜出。

最近重读《我与兰登书屋》,我想起爸爸在和我拉家常的时候教给我的人生智慧,许多都能在书中找到。诚然,他的故事非常有趣;如果换了其他行为方式他也不会这样。不过,这本书也可以作为自传性的行业手册来读:一本“如何成功”的入门读物,为下面这些普遍性观念带来了全新的选择:格特鲁德·斯泰因也许说过,经理人就是经理人就是经理人;一个来自其他行业的资深经理人来到一家公司,经营得比一个花了一辈子心血掌握他公司所在行业方方面面知识的人,一样好甚至更好;每一次交易就是一场输赢非常重要的博弈;商场如战

① 在英语中 column 有“柱子”义,也有“专栏”义。

② 扬基队是纽约最著名的棒球队。

场,没有精神价值,没有幽默,对了,还没有乐趣。“人们体面的时候,人人的事情都好办。”爸爸教导我们,“那是我一辈子都遵循的理论。如果你赚钱,要让别人也赚……如果你做的事情让每个人都得到好处,那才是理想的生意。”如果这种理念能被广泛地接受,现在的许多企业一定会经营得更顺利!

对我来说,爸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特点是他永远的乐观——他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快乐, (“他是我见过最快乐的人。”他的好朋友莱昂诺拉·霍恩布娄赞道。)而且他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能把这种快乐带给他周围的每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父亲追悼会上,威廉·斯泰伦的话让我热泪盈眶,他称我父亲是“提升生命价值的人”。贝内特·瑟夫可能没有想过自己会获得这么深刻的赞誉。“一点点幽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他在《我与兰登书屋》中告诉我们,“那一直是我的信条。有人曾经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我总是说,我希望这样写,‘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

今天,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贝内特·瑟夫去世差不多已经三十年了。与许多其他名人、成功人士的子女不同的是,我深深热爱我的父亲,几乎毫不保留地崇拜他。我永远都怀念他。

克里斯托弗·瑟夫

二〇〇一年九月

原版出版说明

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间，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玛丽·R·霍金斯对贝内特·瑟夫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这些访谈均有录音和文字整理，经他初步校订后又重新打字。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使口述历史的内容一直更新到最近的时间。

撰写《我与兰登书屋》是他本人的主意(书名也是他取的)，写作的方式是从一千多页打字稿中整理，把问题删掉，重新安排布局，校订、润色文本，补写他访谈时没想到的内容。在一九七一年八月猝死之前，他已经开始写了，而且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里，他经常跟我们和别人说起他对这本书的想法。如果他能活着写完，我们一定会参与他的整个写作过程，而不是带着悲伤的心情，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努力贯彻他的意图。

口述历史的材料是《我与兰登书屋》的主要素材，但不是惟一素材。极少有人会像贝内特这么有条理地记录自己的人生，我们从中获益匪浅：他保存着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时代的日记，到国外旅行的日记更多；精心保存的大量剪贴本，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参考文献图书馆，里面有关于兰登书屋和他自己的新闻、以及几百篇他发表的文章剪报；大堆大堆他按照顺序有条不紊整理好的书信(很明显，他几乎从不扔信)。

所有这些资料在贝内特的记忆偶尔出现疏漏的时候，都成了核对日期、事实最宝贵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们实质上构成了本书的内容。当我们发现对同样的主题，他很久以前写的文章比口述历史的更好时，我们就采用前者。在他的旅行日记中有好几则他当场写的片断，比他多年以后在访谈中回忆的更有趣更详尽，我们就替换掉访谈中的回忆内容。最后，在从大量口述历史素材

中选择材料的问题上,我们都是以他自己为这本书定的书名,和我们估计他本人也会那么做的思路为指导,这样,本书首先就是一本关于出版和他在其中的卓越表现的书。

菲丽丝·瑟夫·瓦格纳

菲丽丝·瑟夫·瓦格纳
阿尔伯特·厄斯金

从1848年到1851年,阿尔伯特·厄斯金在伦敦出版业中度过了一段非常忙碌和富有成果的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出版项目,还通过他的工作,为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为我们了解19世纪中叶的出版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窗口。

阿尔伯特·厄斯金在出版业的工作,始于他在伦敦的早期经历。他最初是在一家小型的出版公司工作,负责处理日常的出版事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他逐渐成为了公司的主管。在这个过程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人脉网络。

在1848年,阿尔伯特·厄斯金参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出版项目。这个项目涉及到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即社会改革。他的工作包括寻找合适的作者,编辑稿件,以及安排印刷和发行。在这个过程中,他展现出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使得这个项目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除了参与具体的出版项目外,阿尔伯特·厄斯金还通过他的工作,为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其他的贡献。他积极推动出版业的改革,提高了出版物的质量和效率。他还通过他的工作,促进了出版业与其他行业的交流与合作,为出版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总的来说,阿尔伯特·厄斯金在出版业的工作经历和成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19世纪中叶出版业的宝贵机会。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出版业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商业活动,更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挑战的领域。通过他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出版业在推动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目 录

序言/1

原版出版说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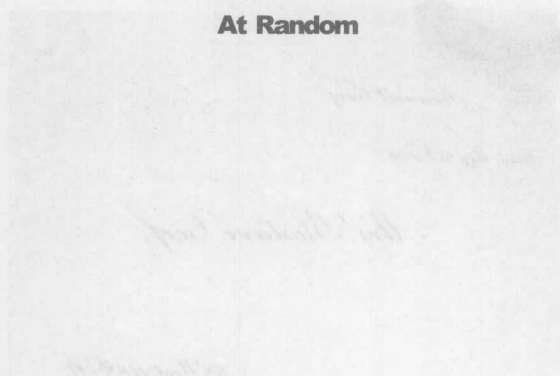
我与兰登书屋/1

译后记/3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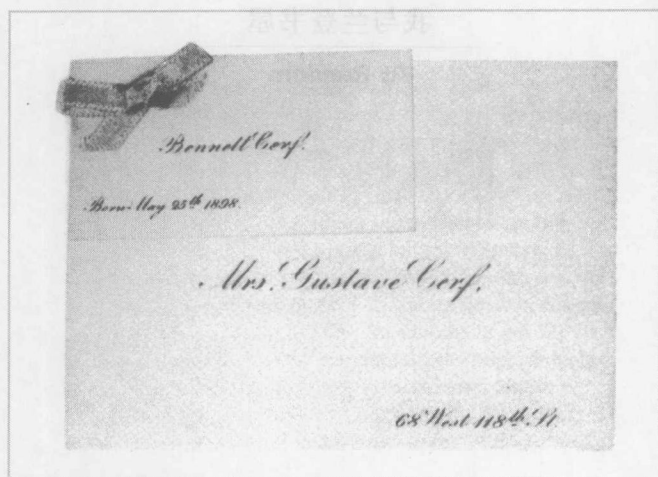
译名对照/322

我与兰登书屋

At Random



“离开书从数家”，特立独行型要上本通管特特内页，即对主出他大基，特内页



贝内特·瑟夫的出生证明。贝内特的剪贴本上是这么加注的：“麻烦从此开始。”

我是个颇为奇怪的人，因为不光是我，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我父母都出生在曼哈顿岛。我爸爸这一支家族来自法国阿尔萨斯，而我妈妈则是一个姓怀斯的德国人后裔。我爸爸的爸爸，马塞尔·瑟夫，是个珠宝商。瑟夫家族很有魅力但没多少钱，而怀斯家族呢，正相反，很有钱但没什么魅力。我外公内森·怀斯拥有一家烟草经销公司——大都会烟草公司——在他稳健的经营下，他积累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家产，后来这笔家产的分配方式在我事业起步阶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每个人都奉承我外公怀斯，他蓄着大胡子，不苟言笑，看起来就像当时印在“史密斯兄弟”牌止咳药包装盒上史密斯兄弟中的一个。我主要是在星期天才会见到他，这是跟他们一家吃晚饭的固定日子。我妈妈有五个兄弟姐妹，三个兄弟两个姐妹。外公有一幢私家大宅，生活颇为优渥，他的汽车是我这辈子见到的第一辆汽车。他用手背打人很有一套。在餐桌上他会猛然伸手过来，没等你反应过来就打你一下。所以每到星期天晚餐时，挨过打的人都坐得离他远远的，越远越好。下午他午睡的时候，屋子里必须像教堂一样安静。我一辈子都没有安静的时候，所以常常会把他的吵醒，挨他反手一巴掌。

我爸爸古斯塔夫·瑟夫长得很帅，又讨人喜欢。我很崇拜他，人人都喜欢他。他的工作是平版印刷工，业余兼职教演讲课，一度还考虑过打职业棒球。他曾经作为接球手打过周末的半职业比赛，一八九二年还参加了布鲁克林道奇队的一场联赛预赛。他一辈子都被我们取笑没能参加职业棒球大联盟当接球手，不过不管我们多少次拿他开玩笑，他总要花很长时间解释为什么他没去打

棒球。

我父母是通过一种相当奇怪的方式相识的。那时候上大学的女孩不多，至少我们家生活的圈子里是这样。不过我父母年轻的时候，体面人家的小姐上点演讲课、会朗诵《男孩站在燃烧的甲板上》这样的诗，已被认为是颇为重要的事。我妈妈弗雷德里卡·怀斯家就请来一个老师教她上演讲课，这位教书先生就是我爸爸。这对师生陷入了热恋，然后私奔——这令我外公暴跳如雷，他觉得我爸爸是个讨人喜欢但不牢靠的家伙。但他俩一辈子都彼此深爱。我就这样，出生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里。

我出生的房子所在的位置现在是纽约最破的地区之一——第一一八街，就在和第七大道相交的地方——可它一度是最繁华的犹太人社区。后来，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搬进了附近的第一二一街西二〇一号，道格拉斯公寓楼。

我爸爸是个很骄傲的人，一家的生活全靠他一个人挣钱。我在城里长大，在街头巷尾跟一大群强壮的小孩打棍子球^①，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很出名。那时



贝内特与爸爸的合影（一八九九年十月一日）

^① 棍子球(stickball)是美国小孩在街上玩的游戏，类似棒球。